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 資本主義想像與身份認同

The Capitalist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of Liberal Christians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許俊琳
XU Junlin

作者簡介

許俊琳，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XU Junlin, Lecturer at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xujunlin815@163.com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labor movements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postwar period, liberal Christians in China engaged in wide-ranging discussions on capital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ir views on capitalism mainly drew on Anti-capitalism thought among the Western churches in the wak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ombining this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ey constructed an essentially negative image of capitalism and failed to face up practically to the positive values of capitalism. Their primary aim was to respond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apitalism from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and defend Christianity by disentangl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ism. Their second was to discuss how to establish an ideal China, with the cor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establish a new China with western capitalism as its model. Finally, by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apitalism, they could reflect on the shortcomings of present-day Christianity to rebuild a reasoned Christian identity,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hristianity for reforming capitalism and rebuilding an ideal China, and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religious identity of Christianity. In short, capitalism had become a way for liberal Christians to reconstruct their nation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Keywords: May Forth Period, Christian, capitalism, identity

在近代中國歷史敘事的中心，基督教似乎處在邊緣的位置。但對當時的基督徒而言，特別是其中的自由派，並不甘居邊緣，他們時刻保持着與中心的對話，努力參與近代中國歷史的核心進程，甚至不乏要引領時代、獲取領導權的抱負和自信。早在1919年《教務雜誌》就強調“中國的基督教會是領導中國的社會重建，還是僅僅對其他領袖們所犯的錯誤提供一些消極性措施？如果它在今天的中國是一種有活力的力量，它就必須指導所有引人矚目的運動”^①。用1925年王治心的話來講，就是基督教必須打入中國社會的中心，若“基督教思想不能與社會接觸，則基督教在中國的根基，是沙土而非磐石”。^②而當時中國時代的核心議題就是救國並建立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基督徒積極涉入其中。因為他們明白“與中國民族運動合作是基督教借以實現其在中國使命的現代方式之一”^③。資本主義問題即是他們與中心主流話語互動的一個窗口。

五四時期^④是中國重新規劃國家未來和重建國家身份的轉折點，在對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中，不同的醫國之士開出了不同的藥方，各種建國方案在相互區隔中又相互聯繫，在共享部分資源的同時形成不同的思想光譜和政治認同，其中的核心是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離合。過去的研究比較多討論近代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而較少探討對資本主義反思或捨棄。事實上資本主義一直是近代中國重建國家身份和政治認

^① Editorial, "The Christian Opportunity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0, no.11 (1919): 719.

^② 王治心：《如何使基督教文字打到社會的中心》，《文社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9-12頁。[WANG Zhixin, "How to Make the Christian Writings Reach the Center of Societ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2 (1925): 9-12.]

^③ Editorial, "Towards a United Christian Front," *The Chinese Recorder* 68, no.6 (1937): 343.

^④ 本文使用廣義的“大五四”概念，其起止時間大致可涵蓋1915-1927年。

同的重要參變量。五四時期自由派基督徒分享和參與了這一歷史進程，但受到中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份的制約，與主流呼應和對話的同時也有其獨特性。作為中國人，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與其他國人一樣也一直試圖重構一種理想化的國家身份，以彌合從晚清以來纏繞於心的國家認同危機，其中的關鍵在要不要以西方資本主義為典範來建造一個新中國，這就不可避免地進入到政治認同領域。而作為基督徒，其資本主義檢討還受到另一重現實的催迫，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將基督教和資本主義捆綁批判，視基督教為資本主義的“走狗”或“幫凶”，促使基督徒不得不回應這種指責，妥當地處理二者的關係，進而為他們重建基督教的合理身份、維繫自我的宗教認同尋求新的可能。而作為兩種身份的疊加——中國基督徒，他們又不得不把基督教與救國的政治目的相聯繫，與資本主義的碰撞和比較正好為他們提倡基督教的救國方案提供了一個契機。因此，五四自由派基督徒對資本主義的想像關涉到一種多重的身份認同，成為基督徒構建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的一種外在資源。他們所構建的資本主義形象正是具有上述目的的主觀想像的結果。本文正是試圖釐清五四自由派基督徒呈現的這數種邏輯，以便更深入理解五四思想的歧義性，澄清對基督徒諸多誤讀的同時了解他們與主流中心互動的複雜性。^①

一、西方在中國的延續：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資本主義認知的來源

西方對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資本主義觀的影響主要在以下幾個方

^① 關於這一問題，學術界研究較薄弱，主要的成果有楊衛華：《資本主義是中國的出路嗎：民國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東嶽論叢》，2013年第11期，第41-47頁。該文對本文的研究頗有啟發。該文主要研究了民國基督徒以資本主義為參照思考中國出路這一問題，而本文在全面探討五四自由派基督徒對資本主義的認知及其身份認同。[YANG Weihua, "Is Capitalism the Way Out of China: The Christian's Imagin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Republic," *Dongyue Tribune*, no.11 (2013): 41-47.]

面，一個是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包括在西方現實發生的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湧入中國，成為五四社會思潮的中心；其次是中國資本主義尚處在起步階段，因此基督徒反省的對象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再次五四自由派基督徒所能仰仗的有關資本主義的反思性思想資源也多來自西方，只不過因為教會的连接，他們所採摘的資源多出自西方基督教界。而中國的現實語境為他們的承接提供了接受的楔子。

1920年前後西方教會的資本主義觀是一幅多元立體畫，既有反對也有相反的風景，但五四自由派基督徒選擇性地更多引入了反對的部分。西方教會反思的起點是西方式的，意在解決西方問題，本與中國無關，但中國的現實為五四基督徒繼承這部分遺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基督教和資本主義關係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既有韋伯所論證的基督教為資本主義提供精神倫理的一面，也存在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和倫理修正。事實上教會內部一直存在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傳統，從道德和情感上厭惡資本主義。^① 這個傳統在一戰和十月革命衝擊下獲得更多證據的滋養，與一戰後西方整體上的文明反省合流，秉持着對西方社會和基督教命運的憂慮和使命感，西方教會瀰漫着一種反資本主義情緒，基督教的先知使命和救贖主義，促使一些教會領袖試圖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尋求替代者，承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而這種思想取向與五四基督徒的普遍心境相契合。

中西一個共同的大背景是一戰。一戰帶來西方自我的文明反省，十月革命破舊立新也導致新舊秩序的衝突，這種思潮波及到西方教會，也很快被引入中國教會。資本主義對西方而言是過去和現在進行時，過去作為文明象徵的制度現在布滿殘缺，修正甚或徹底改造迫在眉睫。受一戰的刺激，西方教會曾特組織世界基督教戰爭調查委員會，出版《教會與實業的改造》。1923年廣學會編輯謝頌羔曾參照

^① 參見米塞斯：《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夏道平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
[Ludwig von Mises,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trans. XIA Daoping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1).]

中國實際，將該書編譯為《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作為中國教會的參考。該書指斥現代工業制度輕忽人生的價值，把人當機器，勞工待遇不平等，不但戕害其身體，也阻礙人格的發展；毫無人類同胞的觀念，損人利己，利益至上，貧富不均；違反服務定理，工作不是為服務公眾而是私利，生出種種危害社會的惡勢力。該書還指出資本主義既然僅有百餘年歷史就證明其並非天經地義，成為社會不安和混亂的導線，必須設法改良。作者以基督教的社會理想作為評判的標準，當然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尋求改良之策，強調並非“用唯物歷史觀去做根據，也不是附和無政府黨和共產主義者，去採取破壞的手段，‘以暴易暴’式的做那推翻政府和一切社會制度的革命政策”。而是要以愛人、同情和服務為改良的原則，以和平而非暴動擾亂為手段，去實行有普遍利益於社會人群的制度。^①本書的基調帶有典型的基督教改良主義的色彩，資本主義必須改良，但是是以基督教的和平而非其他暴力的方式，企圖把資本主義的修正或替代導向以基督教為根基的社會制度，在尋求現實困境解決的同時抬高基督教的價值。本書影響非常大，後來基督徒大多延續了這種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走出基督教中間道路的思想邏輯。

這種思想傾向在對中國基督教影響巨大的美國教會中也分外耀眼。早在1917年，美國社會福音派巨擘饒申布什（W. Rauschenbusch）在其名著《社會福音的神學》中，就曾指出資本主義效力顯然易見，但“他的壞處，能夠破壞人道，使平民更為困苦”，它致使少數人手握裁制權，作掠奪壓迫的利器，其宗旨在增進私利而非眾人公益，走向專制而成為民治主義的敵人。所以他呼籲以更為高尚旨在利益平均分配的協力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斷言“資本主義，必像

^① 謝頌羔編譯：《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上海：廣學會，1923年，第10-34頁。
[Z. K. Zia, trans. & ed., *Church and Modern Industrial Issues*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3), 10-34.]

古代時的封建制度，在人類的歷史上，只成了一種醜惡的紀念品而已”^①。作者着眼基督教人道主義，對資本主義予以道德批判，以帶有基督教色彩的協力主義來改造這個社會分裂者及公共利益的敵人。1923年廣學會曾翻譯該書出版，其社會福音在中國影響很大。而到1919年，美國基督教協會出台由著名教會領袖華德（Harry F. Ward）起草的決議案，強調中產階級正在變成特殊階級，雖明了資本制度的罪惡，但本身受其恩惠而沒有或不敢對之加以反對；“資本主義正在崩潰，這是必然的趨勢，因為它是一種有組織的自私自利——它的根本原則已經是錯誤的”；政治民主主義正處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經濟帝國主義的夾攻下求生存；如果現有的鬥爭不能遵循理性的方法和有秩序的進步加以終止，世界會遭受更多的衝突以致毀滅。^②從中可見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情感厭惡，斷言它即將崩潰，也增添了教會改造它的急迫性和使命感。

這些思想資源通過書籍、翻譯、會議、書信、傳教士個人等多種方式傳遞到中國。比如1924年美國中西部各大學學生代表在夏令會期間曾致信中國：“我們深信勞工神聖，無論男女老幼的勞動者，都不應受資本家的摧殘，我們信西國資本主義的流弊應極力破除。”^③西方教會對資本主義深深的憂慮感染着中國基督徒，他們迫切希望掃除資本主義帶來的弊病，其中充斥着對勞工的人道主義關懷，同時帶有改良主義的印記。

^① 羅遜武：《社會福音的神學》，林鴻飛譯，上海：廣學會，1923年，第109-111頁。[W. Rauschenbusch, *The Theology of the Social Gospel*, trans. LIN Hongfei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3), 109-111.]

^② 鮑茄德斯：《社會思想史》（第6冊），徐卓英、顧潤卿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922-923頁。[Emory. S. Bogardu,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Vol. 6, trans. XU Zhuoying and GU Runqi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922-923.]

^③ 徐寶謙譯：《美國學界致中國學界的一封信》，《聖公會報》，1924年第16卷第24期，第27頁。[XU Baoqian, trans., “A Letter from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to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Chinese Churchman* 16, no.24 (1924): 27.]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接納西方新思潮的另一個重要契機是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北京會議。該會成為中國非基運動的導火線，但弔詭的是在運動批判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污之際，參會的各國代表卻在檢討資本主義。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能否改變以表顯基督之精神、是否需要完全推翻等進行熱烈討論，態度不一。捷克代表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必須推翻，其與真正的基督教相衝突；印度代表則以為不能完全變更，只能設法使其合乎基督教思想；中國代表強調完全推翻必然會妨礙各種事業進步，應以改良使勞資互助合作，生產共有；菲律賓代表認為其是否為害要視服務精神的存廢而定；澳大利亞代表則認為其弊端在競爭，造成懶惰富翁與失業，改良不過是完全推翻的第一步；緬甸代表聲稱儘管不能立即將其推翻，但必須改變；另一菲律賓代表認為其專在利己，與上帝第十條誠律不可起貪心衝突。會議主席最後總結認為“吾人無不一致承認資本主義制度，有各種大罪惡，但如何更動之方法，則各有不同……或謂現在制度，猶能輸以新精神而加以改良；或者謂此種制度，完全應當撲滅”。會議最後承認資本主義有幾大罪惡：個人較財產價值為低；動機自私；少數人凌駕於多數人之上；階級差距擴大釀成利益衝突；生產在牟利不在效用；無限制競爭。在分歧中，大會採取折中的方式：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與否，在着手改良後，自能見出。但不能用強力手段，應以漸變為第一步。^①這成為資本主義在世界基督徒心中形象的一個縮影，儘管對是否根本推翻有分歧，但其罪惡重重需要修正卻是共識。作為在中國舉行的第一次基督教國際會議，這次世界性會議成為五四基督徒最好的教育。

華德1925年中國之行也是對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資本主義觀衝擊很大的一次，華德是美國反資本主義的先行者。在信徒陪伴下，他在

^①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執行部編：《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大會分股討論會紀錄》（上海，1922），第22頁。上海檔案館藏：U120-0-420-[5]。[The Executive Departments of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eds., *Records of Discussion of the 11th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Shanghai, 1922): 22. Shanghai Archives Collection, Collection number: U120-0-420-[5].]

北大等高校講工業倫理多次，又在天津、濟南、上海、廣州、武漢、南京等地巡講，演講及其著作被譯出版，在中國教俗兩界都有較大影響。他在工業倫理的演講中指出工業主義之形體及作為，有好多是不合人道的，專制的和不公道的，是違反人類道德判斷的，因此要加以批評。^①他強調“資本主義的學說，實是自古以來對於人類道德的本性之最殘暴的虐待”^②。可見他批判資本主義的起點是倫理的，充斥着人道主義的道德關懷。他宣稱資本主義將因其失敗而退出歷史舞臺，“在今日智識生活中，我們得有一卓著的事實——即是全世界的革命以反抗資本主義。美術界、文學界及技術界——即實用的科學家——都一起拒絕之，擯棄之。而拒絕之尤烈者，則為平民群眾，因為他們對於資本主義之剝奪及壓制其自由，違反公道，及阻礙人類同胞之旨之實現，他們所渴求的都不得到——不能再事容忍了。所以人民將必改革之。這樣的制度，既不能滿足人實際的需要，又拒絕且反對其倫理的理想，再以橫逆加諸其良心——如此的惡制度無繼續幹下去之可能的”。^③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成為各階層唾棄的落水狗，文化領導權渙散無餘，必將走向沒落。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教會領袖現身說法，對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影響可想而知。

華德在教會的演講則多聚焦宗教問題，從基督教角度批判資本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原則之上，而耶穌的福音則完全建立於平等的基礎的，那福音常要減少及掃除人生的不平等，而資本主義的工業組織，則主張唯有保持不平等的概況，乃能

^① 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0號，第2頁。[Harry F. Ward,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0 (1925): 2.]

^② 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4號，第2頁。[Harry F. Ward,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4 (1925): 2.]

^③ 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8號，第3-4頁。[Harry F. Ward,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8 (1925): 3-4.]

共同辦理經濟的事情，兩者根本的衝突端在此點”。所以他把資本主義置於上帝的對立面。他強調資本主義對人類有過恩惠，但含一大錯謬，其立足點在少數人宰制多數人，更將利己視為人生最大推動力，貶低人格，基督教沒能向之挑戰而接受其謬論是一大遺憾。基督教必須以相互作用、均分共享取代以強治弱，發展個人為全體服務取代利己動機，發動一場人生動機的革命，此即基督教的革命任務。但他並不同意共產革命的方式。^① 華德以其權威及影響力對重塑中國基督教的資本主義觀作用巨大，他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及對共產主義的退拒，為基督教革命的出台鋪平道路。

此外，當時湧入中國的西方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也是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衡量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尺，這進一步增添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反感。他們與處在中心的主流思想界分享許多共同的思想取向，他們基本接納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甚至許多人贊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儘管不贊成共產主義治病的方式。他們比較傾向於一種溫和的社會主義，最好還帶有基督教的色彩。因此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包括日本賀川豐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在1920年代的中國基督徒中有很大的市場，這也是他們借以取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方案。^②

二、中國聲音：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資本主義反省是西方教會的延續，同樣離

^① 華德：《革命的基督教》，簡又文編譯，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年，第31-39、149-150頁。[Harry F. Ward,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trans. & ed. Timothy Jen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Literature, 1926), 31-39, 149-150.]

^② 參見劉家峰、劉莉：《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4-112頁；楊衛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華的傳播及影響》，《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第1期，第27-36頁。[LIU Jiafeng and LIU Li,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Modern China," *Religious Studies*, no.3 (2009): 104-112; YANG Weihua,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 Socialism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no.1 (2013): 27-36.]

不開一戰和十月革命的國際背景，而中國工人運動崛起後勞資衝突迭起，特別是社會主義漸漸有了一種話語權威，則成為其本土語境，因此中國聲音並非西方的簡單翻版。

在一戰衝擊下，西方不再是進步和文明的完整象徵。西方戰爭和文明反省的核心是反思資本主義的善惡，它被視為一戰和西方混亂的背後原因，中國基督徒也接受了這種因果邏輯。1920年蔣少惇指出一戰完全與國際商業資本主義有關，釀成空前戰爭、殺人慘劇。他指控資本主義帶來貧富差距，少數資本家在享受產業的同時以專制強暴壓制勞工，工商目的不在為人類社會需要而在私利，這是“敵基督教的”，任其發展會導致“世界罪惡的戰爭愈甚”，應遭遇基督教的反抗。他呼籲基督教和勞工結盟“來抵制那禍世的資本主義”，謀求經濟的自由和社會的公平，發揚基督教人道主義，“使教會與社會能相輔而徐進，達到一個理想或宗教的社會主義之極境”，這樣才能“使世界的戰禍，可以永彌不發”^①。蔣的控訴充斥着人道主義，飽含對勞工的同情，而附帶道德的審判。既然資本主義是大戰和勞資壓榨的原因，那麼彌合戰爭和壓迫的最好方法就是破除資本主義。

1922年青年會的俠公也指出：“現有的工業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的變相，正像從前的奴隸制度一般”。他強調有“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因為“現有的資本主義，有很多地方不合社會的正道。所以凡研究社會學的，都要起來反對他。具體的說法：資本主義到底有甚麼危險呢？”它利用他人工作謀自己的財富、分配不均、釀成唯物主義（全社會追隨資本家拿經濟和物質作生活的準則）視為最激烈、最能表明其罪惡的罪狀，它導致階級和國際仇恨。據此他呼籲經濟改革，對富人課重稅，讓其覺悟分財產於窮人。^②作者同樣在反對資本主義

^① 蔣少惇：《促進宗教與社會文化相輔的勢力》，《青年進步》，1920年第40冊，第47-50頁。[JIANG Shaodun, "The Power of Promot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Culture," *Association Progress* 40 (1920): 47-50.]

^② 俠公：《社會和經濟》，《青年進步》，1922年第51冊，第34-41頁。[XIA Gong, "Soci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 Progress* 51 (1922): 34-41.]

的同時尋求其改造，期待更合理的經濟制度，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走向制度批判。

同年同屬青年會的胡任夫也對資本主義帶來的罪惡加以批判，他認為君權式資本制度的興起，壟斷世界市場，求達一己私欲，獲利成為商業界的最後目的，犧牲人類健康和利益也在所不惜，對社會不負責任，對人道主義不關痛癢。“所謂西方文化的工業界的組織，可說完全是不道德的，無教化的。他的標準是自私的標準，他的福音是非基督教的福音。在他們的背後，有野蠻性的政治作他的護法，而他們自身又做野蠻性的政治的前驅。於是政治和工業，就彼此締結非神聖的聯盟，狼狽為奸。而人類野蠻性的毒焰，便咄咄逼人了”。報館、議院也因金錢的驅使，不敢與其對抗。^① 作者同樣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對資本主義予以道德批判，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全部都是負面的堆積，是迫切需要改變和拯救的制度。

除了這些基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批評，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呈現出的亂象（特別是勞資衝突）也讓人心有餘悸。1923年謝頌羔編譯的《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就提醒到：妨害西方的工業問題已侵入中國，使中國社會呈現不安之象，所以亟待預防西方資本制度的弊端。^② 同年興華報主筆羅運炎也倡議防患於未然，他強調勞工問題並非僅是歐美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中國工業進化雖晚，但工人運動已由醞釀進入實行期，罷工風潮迭起，失業趨於嚴重，如不速解決防患未然，將不免於暴動，成為國家一大隱患。^③ 因此，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向全國教會發出呼籲，指出中國“按目前的情形，勞工資本間之爭，雖不見十分緊張，而因情形和家境的困難已漸漸呈不安之象。故各地已多有

^① 任夫：《世界改造與耶穌基督的誕生》，《青年進步》，1922年第58冊，第34頁。[REN F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Association Progress* 58 (1922):34.]

^② 謝頌羔編譯：《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第1-2頁，第83頁。

^③ 羅運炎：《基督教與工業》，《興華報》，1923年第20卷第4冊，第5頁。[LUO Yunyan, "Christianity and Industry," *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20, no.4 (1923): 5.]

罷工之情事。如今日不因勢利導，立改西方工業制度之非，則西方工人最激烈舉動，或將重現於中國，並且中國工人較之西方工人缺乏知識，若果然演至工禍崩潰時，其為害之烈，當更甚於西方”。^①在中國初步顯示出資本主義弊端之際，他們都對其下的勞資衝突、失業罷工等病症充滿警惕，這成為他們反感資本主義最直觀的證據，這是中國現實給予的一種直接衝擊。

當中外基督徒正在謀求資本主義的改造之際，其中發生了一段弔詭的插曲。1922年3月，爆發了長達五年的非基督教運動，頻繁地將基督教和資本主義捆綁批判，攻擊前者是後者的走狗和幫凶，對內壓制工人階級，對外奴役被壓迫民族。^②本來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督教卻反而被視為其盟友，基督徒不得不起而辯護，撇清雙方的關聯。1922年廣東信徒梁均默就辯稱“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絕無因緣”，且耶穌“實在是古今中外唯一底反對資本主義底實行者”，“沒有資本制度，那基督教會之發達，斷不止今日底地位。益見資本主義就是基督教底至大仇敵，基督教為自身保存起見，也只有排斥而絕無鼓吹資本主義底道理了”^③。在他看來，基督教不但不是資本主義的朋友反而是它的反對者。同年著名教會報人張亦鏡也宣稱：“本來資本制度，是不應存在的”，“我們基督教學生，沒一個不服膺基督平等自由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對擁護資本主義的人的”^④。到1925年魏希本還在聲言“耶穌與貧民往來，為他們請命，攻訐為富不仁者，基

^① 《不可不注意的事實》，《中華歸主》，1923年第32期，第2頁。[“An Inescapable Fact,” *China Occupation*, no.32 (1923): 2.]

^②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晨報》，1922年3月17日，第7版。[“Declaration of Anti-Christian Student Union,” *Morning News* (March 17, 1922): 7.]

^③ 均默：《駁盧淑之基督教與資本主義》，載《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真光雜誌社編，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7年，第64-71頁。[JUN Mo, “Refuting LU Shuzhi’s Christianity and Capitalism,” in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of Criticizing Anti-Christianity*, ed. The True Light Press (Shanghai: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27), 64-71.]

^④ 亦鏡：《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載《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第19-20頁。[YI Jing, “Criticizing the Declaration of Anti-Christian Student Union,” in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of Criticizing Anti-Christianity*, 19-20.]

督教是貧民的福音，如何又是資本主義的走狗呢？”^① 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不但不是資本主義的走狗，還是它的對立面和敵人。

比較中外基督徒對資本主義的控訴，實與各派社會主義分享許多共同的理論取向，現在卻反遭激進社會主義者的攻擊，因此他們試圖構建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親密來澄清它與資本主義的關聯。簡又文就看到將二者牽扯是受各種激烈社會主義的影響，社會主義發生初確曾反對過基督教，基督教初也因誤會反對社會主義。但雙方現已相互了解，不但不再相互攻擊且有互相攜手共同改造社會之勢，說基督教擁護資本主義“更全不實了”^②。徐慶譽也辯稱今日提倡社會主義的人多反基督教，殊不知二者並不背馳，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證據，若研究社會主義來源，就會知曉兩者的親密。他指出基督教義絕非擁護資本主義，因為基督教是貧民的福音，沒有擁護特殊階級的臭味，儘管可能存在資本化的教會，但不能因此牽連基督教。^③ 劉維漢也反駁道：受過激社會主義影響者居然說基督教是資本主義護符。他表示“推翻資本階級，我是極端贊同的”，“基督教不但不是帝國主義及資本階級的護符，且與二者不能並立，而為民治主義的先導及無產階級的救星”，乃博愛平等大同之宗教，反對強權為大多數人謀幸福，與社會主義的精神相符，誠為後者策源地。^④ 三人的話語策略是鑒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通過化解與社會主義的誤會構建雙方的親密來反詰對手，同時他們都反對將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牽扯並對後者

^① 魏希本：《我所不解於非教運動者》，《聖公會報》，1926年第19卷第12期，第1頁。[WEI Xiben, "What I don't Understand about People Who Anti-Christianity," *The Chinese Churchman* 19, no.12 (1926): 1.]

^② 簡又文：《非宗教運動與新教育》，《青年進步》，1922年第54冊，第5-6頁。[Timothy Jen, "Anti-Religious Movement and New Education," *Association Progress* 54 (1922): 5-6.]

^③ 徐慶譽：《非宗教同盟與教會革命》，《興華報》，1922年第19卷第29冊，第14-16頁。[XU Qingyu, "Anti-Religious Alliance and Church Revolution," *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 no.29 (1922): 14-16.]

^④ 劉維漢：《竟還有人說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護符》，《真光雜誌》，1926年第25卷第7-8號，第2-4頁。[LIU Weihhan, "Some People Even Say that Christianity is the Protective Talisman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The True Light Review* 25, no.7-8 (1926): 2-4.]

缺乏好感。

在兩種主義的夾攻下，1923年米星如也指出基督教應對資本主義表示態度，否則後者會誤會基督教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則誤會它是資本主義。他認為“現在社會上由於資本制所產出的這三種制度——私產、工資、競爭——是不免根據於人類謬誤的欲望”。這種自私自利的欲望，不僅在於個人，也在於社會上由資本制下所產出的制度。所以不但要改造個人的內心，也要解放和改良那不好的制度。基於這種認識，他聲稱我們不像共產主義般廢除私產，也不像無政府主義般推翻一切組織，“我們是願意和平而痛絕戰爭，是採取進化的手段而拋棄革命的政策。^① 他明顯受到謝頌羔所編一書的影響，主張採取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處理資本主義，將其自私自利變為普遍公益，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走向深入，從道德批判推向制度批判。

由此，資本主義在基督徒中的聲譽趨向負面化，它是基督教的敵人。蒼園表示耶穌教的社會觀念在經濟平等，“運用資本而坐食其利者，皆非耶教所許”^②。竇廣林也認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與耶穌的精神相背馳，基督徒自應絕對的反對”^③。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將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置於對立的兩面，呼籲基督徒起而反對資本主義，並進一步謀求更平等的經濟形態。誠如毛拔所言：“基督教是極力反對資本家階級的，資本家以財自雄，富擬王侯，一般勞工生活程度日高，終日奔走於衣食，卻還不得一飽，不得一暖”。他呼籲要用基督教“溫情的宗教主義，從心思上去改革資本家的資本集中主義，以躋

^① 米星如：《基督教對於資本制下三大問題應有的態度》，《青年進步》，1923年第66冊，第48-52頁。[MI Xingru, "The Attitude of Christianity to the Three Problems under the Capital System," *Association Progress* 66 (1923): 48-52.]

^② 蒼園：《耶穌與合作》，《青年進步》，1923年第66冊，第39頁。[CANG Yuan, "Jesus and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Progress* 66 (1923): 39.]

^③ 竇廣林：《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急應解決的幾個問題》，《真理周刊》，1925年第3卷第17期，第1頁。[BAO Guanglin, "The Problems that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hould Urgently Solve Today," *The Truth* 3, no.17 (1925): 1.]

於經濟平衡之列”。^①

儘管有個別中國基督徒希望能暫借資本主義來推動中國的發展，不贊成片面攻擊資本主義，但五四自由派基督徒基本繼承了西方教會的反資本主義邏輯及其構建對資本主義的刻板印象，這成為他們衡量資本主義的基本出發點。而中國工運迭起、五四社會主義思潮勃興特別是來自中心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成為自由派基督徒構建負面化資本主義形象的現實語境，也是他們與中心互動的證據。這套矮化資本主義的話語在五四自由派基督徒之中普遍傳播，漸漸內化為他們的思想意識，成為該群體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場合只要想到資本主義便會在腦海中浮現出的圖景。很多中國基督徒並未接觸過西方資本主義（少數留學生或訪問者有短期接觸），而中國資本主義尚處在起步階段，因此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核心了解有限（或不願意正視資本主義的正面意義），但這並不影響他們通過接觸到的各種信息建構和想像中描畫出資本主義的可怖圖景，在有意無意中放大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將其構建為基督教的對立面，成為一個需要被改造甚或消滅的對象。而基本看不到資本主義的正面價值，這種片面的認知對基督徒重構自身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影響巨大。

三、在資本主義他者的映照下：重建身份認同的嘗試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對資本主義反省甚或反對帶有強烈的政治和宗教目的。從政治上講，他們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意圖並不在西方，而是在中國，他們的中心關懷是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甚麼樣的中國。資本主義成為他們重建國家認同的一個參照系，問題化約為一個兩難的議題：中國到底要不要資本主義，要不要建立一個資本主義中國。

^① 毛拔：《基督教的平等精神》，《青年進步》，1927年第105冊，第55-56頁。
[MAO Ba, "The Equal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ssociation Progress* 105 (1927): 55-56.]

華德曾結合其中國考察告誡：中國萬不可走上西方資本主義，他不贊成那種先採行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經濟，然後來處理它的罪惡的實用主義策略。他希望中國能結合自身實際，超越資本主義和俄國共產主義，以科學和道德的方式發展出一條新的道路。他認為這為傳教士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① 作為西方人，華德和在華傳教士並不像中國基督徒那樣帶有強烈的救國使命。但他們也同樣關心中國的命運，因為他們明了這與他們的宗教使命息息相關。除為中國的未來着想，傳教士擔心基督教會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連累，假如中國追隨西方資本主義而帶來悲劇，那麼基督教也會遭遇信譽危機。所以當西方資本主義因為一戰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其弊端、而中國則初現端倪之際，傳教士開始為中國未雨綢繆、出謀劃策。1922年英國貴格會傳教士霍德進（H. T. Hodgkin）警醒中國民眾：西方尚有公眾輿論、工黨、法律等限制資本主義的專橫，而中國則不具備抗衡資本主義罪惡的條件，他呼籲中國要設法應對。^② 可見，傳教士對資本主義流入中國充滿警惕，他們不想資本主義的西方悲劇在中國重演，這將成為基督教不足的證據。

霍德進們的想法很快得到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組織回音，1924年其機關刊物《中華歸主》社論也有同樣的憂慮。社論認為資本主義工業制度是對正義人道教會的莫大挑戰，與基督教是根本對立的，帶來工人生活惡化、階級鬥爭、社會動蕩等罪惡，呼籲基督教必須起而應對，讓工業制度接受基督真道的洗禮，才能最終達到中華歸主的目的。^③ 基於對西方的前車之鑒，他們非常擔心中國落入資本主

^① Harry F. Ward, "China's Industrial Battlefront," *The Christian Century* 43, no.11 (1926): 350-352.

^② 霍德進：《基督與社會改造》，曾約農譯，成都：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2年，第125頁。[H. T. Hodgkin, *Christ and Social Reform*, trans. ZENG Yuenong (Chengdu: 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1942), 125.]

^③ 社論：《近世工業制度對於教會的挑戰》，《中華歸主》，1924年第40期，第1-2頁。[Editorial,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o the Church," *China Occupation*, no.40 (1924): 1-2.]

義重蹈西方的覆轍，並給基督教在中國的事業帶來危險。

這些考量都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為參照，但中西發展階段不一，西方資本主義是已然模式，而中國是更多是未來式或最多是起步階段。中國似乎又需要仰仗資本主義來改變落後的面貌，儘管華德已經對那種以毒攻毒再治療的方式發出警告，但如前所述仍有個別中國基督徒希望暫時藉助資本主義來推動中國的發展，而不贊成片面攻擊資本主義。比如著名教會領袖范定九就強調國家興盛之道，在有積極的建設，資本主義是中國擺脫落後狀態的必然手段。^① 有類似想法的並不止范，1924年孟昭翰也發文指出中國現在工業尚不發達，並無資本也無資本家，沒有資本主義可以推翻，如果鼓吹推翻，會導致蔑視物質、趨於玄想、影響教育，也會使有產者不敢投資影響實業。^② 儘管他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是國際戰爭和勞工悲劇等災難的原因，但落後的中國尚難繞過它。同樣承認資本主義罪惡的詹渭更發出中國需要資本主義論，他提出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增強國際競爭力、消除貧困等方面有積極意義。^③ 儘管他承認資本主義有進一步改進以符合普遍利益的需要，但中國的現實促使他呼籲中國採行資本主義。他們似乎認為中西國情不同，西方是防範資本主義的弊端，而中國則尚未走上資本主義，無所謂推翻反而正需憑藉它發展實業和物質建設。

這種聲音在當時的基督教界乃至國人中都有一定代表性。這確實是一個兩難的抉擇，一方面中國需要資本主義來發展，另一方面又憂慮其帶來的危險。不過總體而言，在一邊倒的資本主義批判中不免單

^① 范定九：《今日大局與思想上之覺悟》，《金陵光》，1925年第2期，第55頁。
[FAN Dingjiu, "The Consciousness of Today's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oughts,"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 no.2 (1925): 55.]

^② 孟昭翰：《基督教會如何改良中國今日底社會》，《青年進步》，1924年第77冊，第18-22頁。[MENG Zhaohan, "How does the Christian Church Improve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Association Progress* 77 (1924): 18-22.]

^③ 詹渭：《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中國社會改造觀》，《青年進步》，1926年第94冊，第1-12頁。[ZHAN Wei,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The View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ssociation Progress* 94 (1926): 1-12.]

一，肯定資本主義價值的聲音淹沒在滾滾批評之中，更何況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態度最多也只是好惡參半，他們實際也承認資本主義的弊端和罪惡，只不過為了發展中國的實業暫時實用主義的藉助資本主義。所以很少有人把中國的國家認同歸向資本主義，他們期待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但不是一個資本主義中國。這與當時主流思想界的心境是一致的。這種思想取向在下述宗教身份的重構中會進一步展現。

除了國家建設目標，五四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更帶有強烈的宗教目的。他們通過對基督教和資本主義關係的反省，以此改正基督教過去的不足，以建立更為合理的基督教身份；其次通過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批判，在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比較中，凸顯基督教的優越性，將基督教塑造為一個社會改造和救國的替代者，以增強基督教的吸引力，維繫並強化對其宗教認同。

前面已提到針對非基運動的攻擊，許多基督徒紛紛撇清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但很多人在深入反省後，也看到兩者確實存在一些負面的連接，只不過很多人將這視為一個西方現象。廣東教會領袖招觀海就認為中國工業不發達，自無資本制度可言，雖有幾個資本家，但基督教尚未與其同惡相濟。但歐美教會多受資本家孵育，為其所壟斷利用，赤俄反教及其他自由黨反教不無理由。^①他傾向於認為基督教在西方確實有和資本主義勾連的事實，但中國因為尚未進入資本主義，所以不應承受這種罪名。

儘管這更多是一個西方故事，並且中西的發展階段並不一致，但許多人也提醒中國基督教因其濃厚的西方背景，也不能掉以輕心。1925年北京教會領袖竇廣林就談道：“傳基督教的國家是商業國——資本主義的國——所以他所傳來的宗教，不無幾分商業的色彩，所

^① 招觀海：《反教風潮中教會應有的自省》，《文社月刊》1926年第1卷第9、10期，第39頁。[ZHAO Guanhai, "The Self-Examina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9-10 (1926): 39.]

立的教會，也難脫資本主義的性質”^①。他言下之意是中國基督教來自西方，也難免有同樣的色彩。汪兆翔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認為儘管基督教本身光明正大，為宗教社會革命的先驅，但西方教會不免為資本家壟斷和帝國主義利用，中國教會因與其連帶關係，不免被誤會為資本家的走狗和帝國主義的幫凶。因此他呼籲教會恢復本真，對革命運動、工人運動等表示贊助，表彰耶穌真精神。^②簡又文強調不管中國將來是否經歷資本主義，基督教都不能陷入其陷阱，他指出：“吾國社會將來果須經過歐美資本主義的階級否，尚未可知；縱或必要，然倘基督教居然是其戎首罪魁，是真大不幸矣。‘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嗚呼！吾為此懼！”^③從中能體會到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憂慮中國基督教像西方一樣因與資本主義的連接而走向悲劇。

因此他們強調基督教必須反省自我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重塑自身合理的中國基督教身份。1922年趙紫宸就看到：“現在中國有識者的思想，大都反對資本主義；今日中國教會雖不與資本主義同化，卻沒有對於經濟不平的狀況有真確的，合乎基督精神的表示。”^④鍾可託也表示：基督教對民生毫無主張，對資本家態度模稜兩可，對資本主義雖不擁護，但未公開反對資本階級的掠奪行動，道德上的責任無可避免。^⑤他們都傾向於認為儘管中國基督教並不像西方那樣與資本主

^① 寶廣林：《現代基督教本身的罪惡——商業化》，《真理周刊》，1925年第3卷第3期，第1頁。[BAO Guanglin, "The Evil of Modern Christianity Itself: Commercialization," *The Truth* 3, no.3 (1925): 1.]

^② 汪兆翔：《基督教對於最近時局當有的態度和措施》，《文社月刊》，1927年第2卷第8期，第12頁。[WANG Zhaoxiang, "The Attitude and Measures of Christianity towar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2, no.8 (1927): 12.]

^③ 簡又文：《三益會與基督教（三續）》，《盡言周刊》，1924年第1卷第7期，第3頁；簡又文：《三益會與基督教（四續）》，《盡言周刊》，1924年第1卷第8期，第3-4頁。[Timothy Jen, "San Yi Hui and Christianity," *Jinyan Weekly* 1, no.7 (1924): 3; Timothy Jen, "San Yi Hui and Christianity," *Jinyan Weekly* 1, no. 8 (1924): 3-4.]

^④ 趙紫宸：《中國教會前途的一大問題》，《生命月刊》，1922年第2卷第8期，第5頁。[T. C. Chao, "A Major Problem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Church," *The Life Monthly* 2, no.8 (1922): 5.]

^⑤ 鍾可託：《基督教與民生》，《直道》，1927年第73期，第1頁。[ZHONG Ketuo, "Christianit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Zhi Dao*, no.73 (1927): 1.]

義關係密切，但同樣對其罪惡無動於衷，這樣的基督教不但不是基督教的本來面貌，也不能應對當今中國的現實。因此基督教必須改革，重建自我身份。簡又文則把中國基督教的身份重構指向社會福音，他強調基督教在中國還沒被資本主義俘獲，而西方教會保守派已為資本主義所劫奪，只教人升天不謀社會拯救，甚且擁護資本主義，這種殭屍化的宗教不隨社會的改變而演進，足以為社會障礙。他指出社會福音能打破教會殭屍化的趨勢，在社會上大施其功能，“以攻擊資本主義，謀完全解放基督教於資本家之手，及努力改造現行的經濟制度了”^①。他以西方教會為參照，強調能剪除資本主義弊端，厲行社會改造的社會福音才是符合耶穌真意的基督教。

簡又文的觀點在當時自由派基督徒中非常具有典型性。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救國關懷在這裏合二為一，他們摒棄守舊的基督教，排斥資本主義作為中國的救國方案，而讓全新的基督教承擔起建構一個新中國的時代使命，將國家認同和宗教認同結合起來，為了中國的未來，也為了基督教在中國有未來，這是他們的中國基督徒身份決定的。因此他們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開始為基督教的出台鋪路。

許多傳教士即把改造資本主義的出路指向基督教。1922年霍德進指出資本制度與耶穌原則相去甚遠，唯有基督的主義才是補救其弊病的最佳方式。^② 作者矮化資本主義，將其建構為基督教的敵人，是為構建起對基督教的宗教認同奠基。1924年福州美以美會東亞合會幹事也在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信中談到現代工業和經濟制度迅速湧入中國，可能是教會面臨的最大危險。若教會不能勸導中國社會在工商業中採納基督教的理想和標準，則不能完成其任務，也會失去有思想的人的信任。^③ 他傾向於認為基督教必須取代資本主義為中國構建一種

^① 簡又文：《同張江二君討論孫科君的文章（續）》，《京報副刊》，1925年第77號，第2-3頁。[Timothy Jen, “Discussing Mr. Sun Kejun’s Article with Mr. Zhang and Mr. Jiang,”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77 (1925): 2-3.]

^② 霍德進：《基督與社會改造》，曾約農譯，第25、141頁。

^③ W. H. Lacy, “Industrial Conditions,”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no.7 (1924): 6.

新的政治經濟倫理和秩序，否則中國落入資本主義對基督教的中國使命是致命的。

中國基督徒也很快接過批評的武器，呼籲基督教必須在資本主義的弊端面前採取更積極的措施，承擔起社會改造和建立新制度的責任。基督教不能對資本主義的罪惡坐視不理，青年會勞工幹事朱懋澄就看到今日經濟制度有很多不完善亟待改良處：注重物質金錢輕視人格；重視私利忽略群眾幸福；容許經濟上無限制競爭，妨害群眾合作。這種惡劣的經濟制度導致兩種趨向：無限制的資本主義及用暴動和階級戰爭推翻資本制度。他認為紛爭無非是為部分人的私利，提出以基督教的精神和原則來加以補救，在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之外走出一條基督之路。^① 梁寒操也強調基督教不能對資本主義無動於衷，他在查考西方各國教會的對策後，認為教會須以基督教精神來規正工業制度。他建議：1. 調查研究工業狀況和問題，宣傳基督教對工業問題的主張。“對於重財輕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應用口舌或文字加以嚴正的攻擊狠切的糾正”；2. 各教會聯合請願國會制定保障工人的法律，對資本加以限制避免集中；3. 鼓吹信徒以服務性質集合資本，組織各種合作社以圖謀更優裕生活，為後起工業模範，同時聯絡同志組織工人服務團，增進工人及子女教育；4. 一致宣言反對壓迫中國工業發展的帝國主義；5. 勞資衝突劇烈，教會應挺身而出，使資本家遷就工人，工人顧惜社會，避免社會的混亂。^② 他希望對資本主義的糾正由言論走向實踐，所走的路仍為一種折中之道。

^① 朱懋澄：《基督教文字事業與職工問題》，《文社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3頁；朱懋澄：《基督教經濟制度的根本原理與實施方法》，載《中華基督教教會年鑒》，1925年第8期，第231-232頁。[ZHU Maocheng,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Work and the Problem of Staff and Workers,"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2 (1925): 3; ZHU Maoche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the Christian Economic System," *The China Church Year Book*, no.8 (1925): 231-232.]

^② 均默：《教會對於工業發展應有之貢獻》，《盡言周刊》，1925年第1卷第47期，第1-3頁。[JUN Mo, "Church's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inyan Weekly* 1, no.47 (1925): 1-3.]

這種個體的聲音很快上升為組織的決定。1927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特開基督化經濟關係大會，中外基督徒60多人與會。大會討論的核心議題即是資本主義如何根本改造。與會的夏秀蘭、霍德進、樂靈生、誠靜怡等中外基督徒都認為資本主義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但他們都不大贊成採取激烈的暴力方式，而倡議推行穩健的方法加以改良，並提出要以經濟基督化的方式提供一個基督教方案來加以應對。^①最後大會議決承認資本主義帶來財富集中、分配不公等多重弊端，必須要以更為合理的基督教的合作經濟關係取而代之。^②這就必然對基督教提出新的要求，基督教自身必須變化，才能承擔起這一任務。因此正是在資本主義的反襯下，五四自由派基督徒才進一步認清了基督教的時代使命，開始重構一種全新的基督教身份來應對資本主義以及時代的挑戰，資本主義成為了基督徒重構自我宗教認同的一種資源。

結語

在對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重構中，是否選擇資本主義，曾經是五四時期主流思想界考慮的一個核心議題。儘管政治取向各有不同，但大多捨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而向往各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替代方案。五四自由派基督徒部分分享了這一集體心境，同時也凸顯出自身的宗教特性，這與他們自身身份的多元性息息相關。他們實際是處在邊緣的位置探討了當時思想界的中心問題。他們時刻保持與中心的互動，回應時代各種流動的思想主題，在選擇性接納、取捨主流思想資源的同時進行有目的性的自我詮釋與改造，進而試圖反饋或影響

^①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基督教經濟關係全國大會報告》，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7年8月，第3-22頁。[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ristian Economic Relations* (Shanghai: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August 1927), 3-22.]

^② C. Y. Hsu, "Christianity and Economic Problems," *Christian Industry* (Shanghai), no.10 (1927): 10-11.

中心，以彌合、重建或維繫自我的身份認同。其中有被動的影響和接納，也有主動的迎合和再創造。

五四自由派基督徒資本主義想像的理論和現實資源多來自西方，但並非是西方資本主義真實的簡單再現，更多是有選擇性地採摘了西方基督教會的反資本主義思想，並以主流的社會主義思潮為參照，而後再結合中國的現實予以再建構，以各種目的性書寫構建出一個基本負面化的資本主義形象。其中淡化或隱諱資本主義的正面價值，聚焦甚至放大它存在的弊端，使資本主義以一種可怖的形象展現在國人面前。讓人一想到資本主義，就會引發失業、勞資衝突、血汗工廠等一系列罪惡的聯想。讓中國人感到資本主義的災難近在咫尺，自覺地在思想上構架起抵制資本主義的藩籬。這麼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為了應對非基督教運動對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結盟的批評，通過與資本主義的身份區隔來維繫基督教自身的正面形象和道德優越性。來自中心的壓力是他們開展話語表述的起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來抵抗西方資本主義方式在中國的傳播，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存在的弊端不但會影響到基督教在中國的聲譽，而且會給中國帶來災難性命運，西方的悲劇不能在中國重演。因此，不管是在國家身份的重新界定還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未來，資本主義都是一個異在的他者，一個中國他者，也是一個與基督教對立的他者。通過對這個他者的矮化和負面建構，來重構中國基督徒的國家認同，在對資本主義方案的捨棄中走向新的國家認同。同時反襯和突顯基督教的優越性，特別是基督教方案在救國和社會改造的效力和價值，它不但可以彌補資本主義的弊端，同時可作為一個最佳的替代性方案，這是為建構和維繫對基督教的宗教認同鋪路的。儘管有極少數人為了發展中國的實業，主張暫時實用主義的採行資本主義，而將對其弊端的治療放在將來。但其實際也贊同對資本主義病症的診斷，在價值層面並不認為資本主義代表中國的未來。並且這種極度有限的聲音也淹沒在對資本主義批評的聲浪中。當然，在自由派內部，因為對資本主義的好惡程度不一，有利

用、改良、改造或徹底顛覆等不同面相的思想取向，這為後來自由派政治分化埋下了伏筆。因此資本主義問題也是他們重構多樣化政治認同的一個因子。此外，對資本主義和基督教關係的再檢討，也為基督教重新認識自我、重構合理化基督教形象和身份提供可能，資本主義作為反面教材，督促並提醒中國基督徒去建構一個更符合中國實際和基督教真理的基督教。

總之，資本主義成為五四自由派基督徒重構自身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的一種方式，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言說與其說是在言說資本主義，不如說是在表述自我，是他們自我欲望的一種投射和自我認同的一種表達。這種從情感上厭惡和矮化資本主義的共同心境，是近代中國群體性捨棄資本主義的一個縮影，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走向影響巨大，因為對資本主義的厭棄成為接納社會主義（不一定是馬克思版本的社會主義）的鋪墊，這一點在過去的研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Editorial. "The Christian Opportunity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50, no.11 (1919): 719.
- Editorial. "Towards a United Christian Front." *The Chinese Recorder* 68, no.6 (1937): 343.
- Hsu, C. Y. "Christianity and Economic Problems." *Christian Industry* (Shanghai), no.10 (1927): 10-11.
- Lacy, W. H. "Industrial Conditions."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no.7 (1924): 6.
- Ward, Harry. F. "China's Industrial Battlefront." *The Christian Century* 43, no.11 (1926): 350-352.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竇廣林:《現代基督教本身的罪惡——商業化》,《真理周刊》,1925年第3卷第3期,第1頁。[BAO Guanglin. "The Evil of Modern Christianity Itself: Commercialization." *The Truth* 3, no.3 (1925): 1.]
- 竇廣林:《今日中國基督教會急應解決的幾個問題》,《真理周刊》,1925年第3卷第17期,第1頁。[BAO Guanglin. "The Problems that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hould Urgently Solve Today." *The Truth* 3, no.17 (1925): 1.]
- 【美】鮑茄德斯:《社會思想史》(第6冊),徐卓英、顧潤卿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Bogardu, Emory. S.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Vol. 6. Translated by XU Zhuoying and GU Runqi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 蒼園:《耶穌與合作》,《青年進步》,1923年第66冊,第39頁。[CANG Yuan. "Jesus and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Progress* 66 (1923): 39.]
- 【美】柴約翰:《一個宣教士思想的演變》,《生命月刊》,1925年第5卷第4期,第33頁。[Childs, J. L. "The Evolution of a Missionary's Thought." *The Life Monthly* 5, no.4 (1925): 33.]
-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晨報》,1922年3月17日,第7版。["Declaration of Anti-Christian Student Union." *Morning News* (March 17, 1922): 7.]
- 【美】霍德進:《基督與社會改造》,曾約農譯,成都: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2年。[Hodgkin, H. T. *Christ and Social Reform*. Translated by ZENG Yuenong. Chengdu:

- United Christian Publishers, 1942.]
- 【美】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0號，第2頁。
[Ward, Harry F.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lated by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0 (1925): 2.]
- 【美】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4號，第2頁。
[Ward, Harry F.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lated by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4 (1925): 2.]
- 【美】華德：《工業主義的倫理》，簡又文譯述，《京報副刊》，1925年第88號，第3-4頁。[Ward, Harry F. "The Ethics of Industrialism." Translated by Timothy Jen.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88 (1925): 3-4.]
- 【美】華德：《革命的基督教》，簡又文編譯，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年。
[Ward, Harry F.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imothy Jen.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Literature, 1926.]
- 簡又文：《非宗教運動與新教育》，《青年進步》，1922年第54冊，第5-6頁。
[Jen, Timothy. "Anti-Religious Movement and New Education." *Association Progress* 54 (1922): 5-6.]
- 簡又文：《三益會與基督教（三續）》，《盡言周刊》，1924年第1卷第7期，第3頁。[Jen, Timothy. "San Yi Hui and Christianity." *Jinyan Weekly* 1, no.7 (1924): 3.]
- 簡又文：《三益會與基督教（四續）》，《盡言周刊》，1924年第1卷第8期，第3-4頁。[Jen, Timothy. "San Yi Hui and Christianity." *Jinyan Weekly* 1, no.8 (1924): 3-4.]
- 簡又文：《同張江二君討論孫科君的文章（續）》，《京報副刊》，1925年第77號，第2-3頁。[Jen, Timothy. "Discussing Mr. Sun Kejun's Article with Mr. Zhang and Mr. Jiang." *Beijing Daily Supplement* 77 (1925): 2-3.]
- 蔣少惇：《促進宗教與社會文化相輔德勢力》，《青年進步》，1920年第40冊，第47-50頁。[JIANG Shaodun. "The Power of Promoting the Complementarit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Culture." *Association Progress* 40 (1920): 47-50.]
- 均默：《教會對於工業發展應有之貢獻》，《盡言周刊》，1925年第1卷第47期，第1-3頁。[JUN Mo. "Church's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inyan Weekly* 1, no.47 (1925): 1-3.]
- 均默：《駁盧淑之基督教與資本主義》，載《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真光雜誌社編，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7年，第64-71頁。[JUN Mo. "Refuting LU Shuzhi's Christianity and Capitalism." In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of Criticizing Anti-Christianity*. Edited by The True Light Press, 64-71. Shanghai: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27.]

劉家峰、劉莉：《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載《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4-112頁。[LIU Jiafeng and LIU Li.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Modern China." *Religious Studies*, no.3 (2009): 104-112.]

劉維漢：《竟還有人說基督教是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護符》，載《真光雜誌》，1926年第25卷第7-8號，第2-4頁。[LIU Weihan. "Some People Even Say that Christianity is the Protective Talisman of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The True Light Review* 25, no.7-8 (1926): 2-4.]

羅運炎：《基督教與工業》，載《興華報》，1923年第20卷第4冊，第5頁。[LUO Yunyan. "Christianity and Industry." *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20, no.4 (1923): 5.]

羅遜武：《社會福音的神學》，林鴻飛譯，上海：廣學會，1923年。[Rauschenbusch, W. *The Theology of the Social Gospel*. Translated by LIN Hongfei.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3.]

毛拔：《基督教的平等精神》，載《青年進步》，1927年第105冊，第55-56頁。[MAO Ba. "The Equal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ssociation Progress* 105 (1927): 55-56.]

孟昭翰：《基督教會如何改良中國今日底社會》，載《青年進步》，1924年第77冊，第18-22頁。[MENG Zhaohan. "How does the Christian Church Improve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Association Progress* 77 (1924): 18-22.]

米星如：《基督教對於資本制下三大問題應有的態度》，載《青年進步》，1923年第66冊，第48-52頁。[MI Xingru. "The Attitude of Christianity to the Three Problems under the Capital System." *Association Progress* 66 (1923): 48-52.]

米塞斯：《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夏道平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Mises, Ludwig Von.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Translated by XIA Daoping.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1.]

任夫：《世界改造與耶穌基督的誕生》，載《青年進步》，1922年第58冊，第34頁。[REN Fu.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Association Progress* 58 (1922): 34.]

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執行部編：《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大會分股討論會紀錄》（上海，1922），第22頁。上海檔案館藏：U120-0-420-[5]。[The Executive Departments of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ed. *Records of Discussion of the 11th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Shanghai, 1922). 22. Shanghai Archives Collection, Collection number: U120-0-420-[5].]

- 社論：《近世工業制度對於教會的挑戰》，載《中華歸主》，1924年第40期，第1-2頁。[Editorial.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o the Church." *China Occupation*, no.40 (1924): 1-2.]
- 汪兆期：《基督教對於最近時局當有的態度和措施》，《文社月刊》，1927年第2卷第8期，第12頁。[WANG Zhaoxiang. "The Attitude and Measures of Christianity towar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2, no.8 (1927): 12.]
- 王治心：《如何使基督教文字打到社會的中心》，載《文社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9-12頁。[WANG Zhixin. "How to Make the Christian Writings Reach the Center of Societ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2 (1925): 9-12.]
- 魏希本：《我所不解於非教運動者》，《聖公會報》，1926年第19卷第12期，第1頁。[WEI Xiben. "What I don't Understand about People who Anti-Christianity." *The Chinese Churchman* 19, no.12 (1926): 1.]
- 俠公：《社會和經濟》，載《青年進步》，1922年第51冊，第34-41頁。[XIA Gong. "Social and Economic." *Association Progress* 51(1922): 34-41.]
- 徐寶謙譯：《美國學界致中國學界的一封信》，載《聖公會報》，16卷24期，1924年12月，第27頁。[XU Baoqian, trans. "A Letter from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to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Chinese Churchman* 16, no.24 (1924): 27.]
- 徐慶譽：《非宗教同盟與教會革命》，《興華報》，1922年第19卷第29冊，第14-16頁。[XU Qingyu. "Anti-Religious Alliance and Church Revolution." *The 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19, no.29 (1922): 14-16.]
- 謝頌羔編譯：《教會與現代工業問題》，上海：廣學會，1923年。[Zia, Z. K., trans. & ed. *Church and Modern Industrial Issues*.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23.]
- 楊衛華：《資本主義是中國的出路嗎：民國基督徒的資本主義想像》，載《東嶽論叢》，2013年第11期，第41-47頁。[YANG Weihua. "Is Capitalism the Way out for China: The Christian's Imagin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Republic." *Dongyue Tribune*, no.11 (2013): 41-47.]
- 楊衛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華的傳播及影響》，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第1期，第27-36頁。[YANG Weihua.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 Socialism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no.1 (2013): 27-36.]
- 亦鏡：《批評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載《批評非基督教言論彙刊全編》，真光雜誌社編，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7年，第19-20頁。[YI Jing. "Criticiz-

ing the Declaration of Anti-Christian Student Union." In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of Criticizing Anti-Christianity*. Edited by The True Light Press, 19-20. Shanghai: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27.]

招觀海：《反教風潮中教會應有的自省》，載《文社月刊》第1卷第9、10期，1926年9月，第39頁。[ZHAO Guanhai. "The Self-Examina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9-10 (1926): 39.]

趙紫宸：《中國教會前途的一大問題》，載《生命月刊》，1922年第2卷第8期，第5頁。[Chao, T. C. "A Major Problem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Church." *The Life Monthly* 2, no.8 (1922): 5.]

詹渭：《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中國社會改造觀》，載《青年進步》，1926年第94冊，第1-12頁。[ZHAN Wei.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The View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ssociation Progress* 94 (1926): 1-12.]

朱懋澄：《基督教文字事業與職工問題》，載《文社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3頁。[ZHU Maocheng.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Work and the Problem of Staff and Workers."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Monthly* 1, no.2 (1925): 3.]